

The
Undetermined
Moment

刘 擎 著

悬而未决的时刻

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Undetermined
Moment

刘 擎 著

悬而未决的时刻

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 / 刘擎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0
ISBN 7-80225-126-5
I.悬... II.刘... III.哲学思想—研究—西方国家
IV.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498 号

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

刘擎 / 著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林涛 秦崑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 × 1 300 1/32

印张:10.25 字数:210 千

版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言

据说,大文豪歌德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最后发出的呼唤是“光明,光明,多一些光明!”后来,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听到了这段(可能是杜撰的)歌德临终遗言,即刻反驳道:“不,温暖,温暖,多一些温暖!因为我们是死于寒冷,而不是死于黑暗。让人致命的不是夜晚,而是严寒。”

光明与温暖不是同在的吗?难道会有什么光明而寒冷的地带?或者黑暗而温暖的处所?

在题为《无知与福佑》^{〔1〕}的演讲中,马克·里拉将这个故事用作结语,以象征西方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知识态度。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启蒙的传统预设了知识与幸福的等同,相信“黑暗与

〔1〕 这是马克·里拉出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席的就职演讲,整理之后发表。见 Mark Lilla, “Ignorance and Bliss,”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5, no. 3 (Summer 2001), pp. 64-75.

寒冷是同在的，而太阳所放射的光芒也将温暖我们”。这一理念构成了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的基础。但在这个主流传统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信念，认为“黑暗，或至少昏暗，是对我们更为适合的环境，只有当我们学会在这种有所限制的视野中生活，我们才会幸福”。〔1〕在这篇演讲中，里拉勾勒出一条贯穿于犹太教、基督教和西方哲学史的“反传统”思想暗流——怀疑“光明”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这一反传统思想在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压制。但是，当整个世界在科学光芒的照耀下变得越来越“光明”的时候，人们却不时地感觉到“寒冷”，对于何为幸福有些茫然失措起来。这种茫然困惑透露出现代世界的基本困境。

对于现代性的思虑与反省形成了本书最主要的问题意识。如果信奉苏格拉底的格言——“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现代人面临的挑战是：彻底反省之后的生活是可以承受的吗？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柏拉图洞穴”中出走，摆脱了黑暗的人们看见了太阳，期望让真理的光芒驱逐蒙昧，在真善美的和谐之中达致期许的幸福。这种观念在近代之后成为西方思想的主导力量。“雅典”与“耶路撒冷”（或者说哲学与启示）之间的紧张与复杂纠葛，到了17世纪似乎决出了胜负。〔2〕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

〔1〕 Lilla, "Ignorance and Bliss," p. 75.

〔2〕 但这不是“真理意义”上的胜负，而是哲学在历史实践中的胜出。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说法，“哲学绝无可能驳倒启示”。参见施特劳斯：《哲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载亨利希·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林国基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动,法国大革命与现代科学兴起的西方世界,在理性化的驱动下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现代”。“启蒙”(enlightening)就是以光芒来照亮:重新评判一切传统的信念与价值,凭借理性的追问、审查、思考与判断,为神话破碎、上帝退隐之后的世俗化世界立法,奠定新的标准。然而,理性化的现代世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世纪最为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尼采、韦伯、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伯林、阿伦特、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等等——都深切地洞察到现代性的困境,并以各自方式来诊断问题的关键所在,也都试图探寻可能的出路。毫无疑问,对现代性的批判性检讨已经成为学界的热门“显学”。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当代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多样的,仍然处在争议之中。因为现代性本身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总体,在其内部蕴含着复杂的多样性与紧张。现代启蒙主义具有“理性的自负”的倾向,却同时也包含着自我怀疑与批判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也是现代性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使得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活着的”生长变化的现实,其未来前景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

以上极为简化的概括只是为了勾勒出本书论题的宽泛背景。对现代性问题展开全面的系统性研究还远不是作者目前所能企及和驾驭的工作。但收入本书的所有篇章都是在现代性的论域之中来讨论某些特定的主题。这些讨论背后也的确贯穿着作者本人的一些基本看法:

对现代性困境的清醒考察应当避免落入某些二元对立的陷

阱。所谓“古今之争”的某种版本暗示着这样一种抉择：要么重返“昏暗而温暖”的“柏拉图洞穴”，要么忍受走出洞穴之后“光明而寒冷”的现代性荒原。这种二元论既虚构了古代也虚构了现代，更简化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同质性总体的思想——无论是予以赞美还是贬斥——也是一种幻觉或迷思。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并不必然迫使我们在“自负的启蒙主义”与“悲观的反启蒙主义”之间做出抉择：要么走向理性主义的科学僭狂，要么陷入反理性的虚无主义深渊。这种极端的二元观念本身恰恰是形而上学的迷雾，是典型的现代思想病症。光明未必总是温暖的，但现代启蒙传统的光芒并不必然将我们带入一条通向寒冷北极的不归之路。这不是现代性真实的困境。因此，试图以理性主义的观念建构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性危机，或者以否定整个现代性的条件与成果为前提来另辟拯救的蹊径，都可能是现代性病症的恶化而不是医治，或者说，这些治疗方案可能会比病症本身更具有灾难性。应对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尚未明晰地敞开，一切终极性的宣判与断言多半是故作惊人之语，都可能失之武断与轻率。正是现代的这种不确定性邀请我们诉诸一种审慎的理性主义，一种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批判性思考，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境遇高度敏感的实践哲学，由此探索可能的出路。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五章侧重于“现代知识与政治的正当性”，所关切的基本问题是，在传统的超验性权威被颠覆之后，现代世界如何为自己重新创立知识的与政

治的权威？这种权威是否具有其正当的依据？“现代”在与传统决裂之后如何可能“无中生有”地为自身奠定基础？第一章通过阐述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的论述脉络，试图澄清现代哲学的困境在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如何“自我确证”，如何为自身奠定批判的规范性标准。第二章所针对的问题是，现代革命所创建的政权如何获得其政治正当性，通过对比分析阿伦特与施米特对此做出的不同阐释，探讨现代性政治解决“自我奠基”悖论的可能。第三章通过具体个案的考察，讨论了后现代知识话语的正当性及其限度。第四章介绍了在后冷战条件下墨菲对左翼政治的再思考，着眼于重新定位激进民主的政治主体问题。第五章涉及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中主权与人权之间的紧张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道干预”的正当性问题。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现代性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始终受到各种思潮的尖锐批判。那么自由主义何以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在应对现代性的困境中是否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又面对着怎样的困难与挑战？第六章和第七章以伯林的思想为中心，分别讨论了伯林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其价值多元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与紧张。第八章针对当代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考察了自由主义所作的批判性回应。第九章对施米特思想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攻击做出初步的批判性考察。

第三部分的四个篇章(第十章至第十三章)都是对特定思想人物的介绍和评论，分别以波普尔、柯拉科夫斯基、斯科特与里拉这四位学者为主题。他们的学术思想与风格有相当大的差

异,但他们都从某种视野出发,警觉到乌托邦意识的危险,对现代性主义的规划——无论是思想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方案——予以批判性的诊断。“反乌托邦思想”是他们共同关切的论题,也构成了本书第三部分的主要焦点。

本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思潮的历史变迁”的阶段研究成果。收入的篇章大多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此,特别感谢《二十一世纪》(香港)、《读书》、《社会学研究》、《学术月刊》、《学术界》、《学海》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予以作者的支持。此次结集出版的文章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扩充、修改与调整。在重读这些文字的过程中,始终忐忑不安,感觉自己无论在论题开掘的深度、论述的严谨与力度还是文献的收集和使用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局限与欠缺之处。在此诚恳求教于学界同人,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 擎

识于 2006 年 8 月 23 日

目 录

| | |
|---|-----------|
| 序言 | 1 |
| 第一部分 现代知识与政治的正当性 | 1 |
| 第一章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哈贝马斯的思想史视野 | 3 |
| 一、黑格尔的十字路口 | 5 |
| 二、尼采及其精神后裔 | 9 |
| 三、哈贝马斯的抉择及其争议 | 17 |
| 第二章 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与阿伦特 的隐秘对话 | 21 |
| 一、作为现代性政治“开端”的革命及其正当性 困境 | 25 |
| 二、“政治行动论”对“主权决断论”的挑战 | 33 |
| 三、结论：两种范式对于自由民主论的意义 | 44 |
| 第三章 后现代主义的“越界”：关于“苏卡尔事件”的 思考 | 49 |
| 一、苏卡尔事件的背景 | 50 |

| | |
|---|-----|
| 二、一个物理学家对于文化研究的实验 | 54 |
| 三、对“越界”的回应：解析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 科学图景 | 59 |
| 四、后现代批判的“主义化”倾向 | 64 |
| 第四章 后冷战时代的左翼政治：墨菲的激进民主 构想 | 69 |
| 一、放弃全面革命，保持激进立场 | 70 |
| 二、公民、社群与激进民主目标 | 74 |
| 三、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 | 78 |
| 四、结语：左翼政治的想象与实践 | 83 |
| 第五章 全球化时代的主权与人权：科索沃危机与政治 理论的迷思 | 86 |
| 一、关于科索沃问题的争议 | 88 |
| 二、“新干涉主义”与国际政治语词 | 94 |
| 三、全球化语境中的人权尺度 | 98 |
| | |
|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自由主义 | 103 |
| | |
| 第六章 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伯林论题的再考察 | 105 |
| 一、伯林的多元性论题及其双重悲剧性 | 107 |
| 二、自由主义对多元性困境的回应 | 112 |
| 三、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及其启示 | 122 |
| 第七章 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 132 |
| 一、伯林：令人困惑的思想源头 | 134 |
| 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紧张 | 140 |
| 三、自由民族主义的可能 | 149 |

| | |
|----------------------------------|-----|
| 四、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语境：创伤记忆与雪耻 情结 | 154 |
| 第八章 共和主义的复兴与自由主义的回应 | 162 |
| 一、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艰难的超越 | 164 |
| 二、共和学派的思想史修正运动：未遂的颠覆 | 170 |
| 三、现代政治状况下的共和主义 | 178 |
| 第九章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 181 |
| 一、施米特的多重面目 | 182 |
| 二、激进性与政治神学根源 | 188 |
| 三、施米特的盲点 | 193 |
| 第三部分 现代性与乌托邦 | 201 |
| 第十章 波普尔与决定论的终结 | 203 |
| 一、生前的显赫与死后的速朽 | 203 |
| 二、作为思想家的风格与意义 | 206 |
| 三、作为哲学家的成就 | 210 |
| 四、对波普尔的两个流行的误解 | 214 |
| 第十一章 柯拉科夫斯基与不确定的现代性 | 219 |
| 一、哲学与宗教 | 221 |
| 二、现代性与非确定性 | 224 |
| 三、克鲁格奖及其争议 | 229 |
| 第十二章 斯科特与现代化的代价 | 233 |
| 一、社会变迁中的政治腐败 | 235 |
| 二、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冲击 | 238 |
| 三、无权者的抵抗 | 242 |

| | |
|------------------------------|-----|
| 四、极端现代主义的社会规划 | 245 |
| 五、结语 | 248 |
| 第十三章 里拉与节制爱欲的癫狂 | 251 |
| 一、马克·里拉的思想生涯 | 252 |
| 二、施特劳斯与伯林 | 254 |
| 三、对批评的回应 | 258 |
| 附录：当代中国的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 | 263 |
| 主要外文人名汉译对照 | 310 |
| 后 记 | 317 |

第一部分

现代知识与政治的正当性

第一章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哈贝马斯的思想史视野

也许，现代性话语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就选错了方向。

——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可能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早在1960年代，他就受到欧洲知识界的高度关注，被视为战后德国年轻一代社会理论家的领袖人物。^{〔1〕}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哈贝马斯矢志不移地、广泛而系统地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力图在揭示启蒙传统内在困境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以继续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这一远大的抱负明确彰显在他1980

〔1〕 参见 Richard J. Bernstein,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p. 1.

年荣获“阿多诺奖”时所发表的答谢辞《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之中。次年，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德国出版，以当代罕见的“思想体系”方式全面阐述了“交往理性”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能性。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但哈贝马斯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一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1981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一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十次演讲与两篇论文汇集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十二讲》，于1985年出版了德文版。1987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收入托马斯·麦卡锡主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1〕}在2001年的访华之旅中，哈贝马斯亲自嘱托曹卫东教授，尽快翻译这部著作，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整整20年之后曹卫东等翻译的中文版终于面世。^{〔2〕}

〔1〕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trans., Frederick G. Lawr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所征引的也大多出自这个英译本。但据曹卫东介绍，哈贝马斯本人对此书的英译并不十分满意。

〔2〕 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出自本书的征引只在引文之后标明页码。